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

关 键 孙雨晴 陈 倩 张新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内容提要:工作和家庭是成年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领域。本文构建了工作 - 家庭平衡观概念,基于现代演化理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通过构建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APC模型)来解析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12年前后达到最低点(时期效应);第二,50后和60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70后和80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世代效应);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45岁左右达到最高(年龄效应);最后,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趋势主要被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三方面共9项社会指标所解释。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拓展了工作和家庭界面的理论体系,为理解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证据。

关键词:工作 - 家庭平衡观 社会变迁 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 中国人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3)11—0133—19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转型变革,由此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更深层面触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转变(蔡华俭等,2020^[1];傅小兰和蔡华俭,2016^[2];高海燕等,2022^[3];黄梓航等,2021^[4];李路路和王鹏,2018^[5])。随着世代更替,新生代的行为风格与之前已大相径庭,引发了之前未曾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体现在婚恋、生育、就业等诸多方面(郭云蔚,2021^[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7];李月和张许颖,2021^[8];郑真真,2021^[9])。这些问题与新生代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价值观变迁息息相关(唐宁玉等,2023^[10];Chen和Lian,2015^[11];Parry和Urwin,2011^[12];Yang等,2018^[13])。工作和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成员对工作和家庭整体性的内在评价偏好情况,以及人们在权衡工作和家庭相对重要度时的态度变化趋势(Cao,2020)^[14]。因此,有必要分析和总结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收稿日期:2022 - 12 - 12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平台企业算法领导的阴暗面:基于权力失衡和意义建构视角的理论研究”(72232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机协作情境下领导不道德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刻板印象的视角”(72202134)。

作者简介:关键,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组织行为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电子邮箱:guanjianjj@sju.edu.cn;孙雨晴,女,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组织公平、不道德行为和跨文化管理,电子邮箱:qayuying@163.com;陈倩,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家庭动机、工作家庭界面和跨文化管理,电子邮箱:qchen20@sju.edu.cn;张新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管理中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电子邮箱:xinanzhang@sju.edu.cn。通讯作者:张新安。

工作和家庭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两个组成部分(Aryee和Luk,1996)^[15],个体如何看待工作和家庭的相对重要程度,反映了其在工作 and 家庭上的价值取向(Arieli等,2020^[16];Jin和Rounds,2012^[17];Sagiv等,2017^[18])。本文将个体对待工作相较于家庭的重要程度定义为工作-家庭平衡观,表示个体在工作 and 家庭之间做出取舍时的价值取向(Loscocco,1989)^[19]。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工作-家庭平衡观代表个体在工作 and 家庭中的态度和行为选择(Bardi和Schwartz,2003^[20];Ros等,1999^[21];Sagiv等,2017^[18];Schwartz,2012^[22];Sortheix等,2015^[23]),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存在紧密联系(Cao,2020)^[14]。以往研究表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充裕的物质供给和安全保障,降低了个体对工作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追求,进而更多地考虑后物质主义,导致人们对待工作和家庭的重要性也出现了差异(Cao,2020)^[14],从而塑造了人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Bianchi,2020^[24];Bigley和Weniger,2019^[25];Gallie,2019^[26];Ollier-Malaterre和Foucreault,2017^[27];Sirola和Pitesa,2018^[28])。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并回答两个研究问题:第一,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二,影响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变迁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拟基于现代演化理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通过构建年龄-时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简称APC模型)来解析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和主要原因,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现象,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化核心趋势,并对现代演化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提供新见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价值观角度探讨影响中国的社会变迁的原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把握社会思想动态和推进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工作-家庭平衡观

价值观涉及什么是好的和有价值的(Williams,1970)^[29],分为文化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两类(Sagiv和Schwartz,2022)^[30]。文化价值观是指一种集体成员被鼓励追求的目标或原则,有助于证明集体成员为追求目标所采取行动的正确性(例如,集体主义)(Schwartz,1999)^[31]。而个人价值观反映一种个人的理想目标,对于个体生活和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例如,工作价值观)(Rokeach,1973)^[32]。就工作-家庭平衡观而言,本文认为,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于工作相对于家庭相对重要程度的价值取向,代表一种个人目标或原则,参考现有文献(Arieli等,2020^[16];Sagiv和Schwartz,2022^[30]),本文将之界定为一种个人价值观。价值观具有相对重要性,并按相对重要性纵向排序,一种价值观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会导致其他价值观相对重要性的下降(Rokeach,1973)^[32],甚至出现价值观对立的情况,即两种价值观完全相反(Schwartz,1992)^[33]。例如,对于“保守-开放”价值观,“保守”和“开放”呈对立关系,分别为“保守-开放”价值观的两端,二者整合起来即得到“保守-开放”价值观。因此,“保守-开放”价值观的分数越高代表着“保守”价值观的重要性比“开放”价值观越高(Ros等,1999^[21];Boer和Fischer,2013^[34];Wolf等,2019^[35])。由此推之,工作和家庭作为生活中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Aryee和Luk,1996)^[15],其重要性具有相互矛盾性,而工作-家庭平衡观反映了人们在工作 and 家庭之间做出排序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看重家庭的人会认为,工作相对家庭没那么重要,反之亦然。因此,其操作性定义为工作重要性减去家庭重要性。也就是说,通过将工作重要性减去家庭重要性,则能够得到“工作-家庭”价值观,即本研究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分数。按照上述定义,“工作-家庭平衡观”分数越高,代表个人在

工作和家庭取舍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工作,表明工作比家庭更重要。

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工作-家庭平衡观符合一般的价值观内涵(Arieli等,2020^[16];Sagiv和Schwartz,2022^[30])。具体地,第一,工作-家庭平衡观能够代表人们对工作和家庭重要性的偏好(Rokeach,1973)^[32]。例如,工作狂(Schaufeli等,2009)^[36]。第二,工作-家庭平衡观是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基本动机目标的认知表征,并促使人们对工作和家庭的重要性进行排序(Rokeach,1973^[32];Schwartz,1996^[37])。例如,为家人准备餐食。第三,人们能够依靠工作-家庭平衡观来形成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准则,并以此评估和证明自己与他人的选择和行为(Rokeach,1973^[32];Schwartz,1996^[37])。例如,选择不同的职业(Arieli等,2016^[38];Bardi等,2014^[39])。

虽然“工作-家庭平衡”和“工作-家庭平衡观”都涉及工作和家庭,但二者存在明显区分。首先,从定义来看,工作-家庭平衡指的是个体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上的投入和满意度的平衡情况(Greenhaus等,2003)^[40],是一种个人状态;而工作-家庭平衡观指的是生活中人们认为工作相对于家庭更重要的程度,是一种个人价值观,二者从定义来看存在本质区别。其次,从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看,工作-家庭平衡强调的是态度和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即人们如何通过改变态度和行为以达到“工作-家庭平衡”(Hirschi等,2019)^[41],而工作-家庭平衡观关注的是态度和行为的原因,即“工作-家庭平衡观”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Arieli等,2020^[16];Sagiv和Schwartz,2022^[30])。由此可见,工作-家庭平衡观不仅与工作-家庭平衡有较大差异,并且能够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更具有解释力。

综上所述,工作-家庭平衡观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能够指引着人们在工作和家庭领域追求自我目标,并做出合适的选择和行为表现(Arieli等,2020^[16];Sagiv和Roccas,2017^[42],2021^[43])。

2. 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本文采用APC模型来探究近30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APC模型是一种研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事件互动的研究方法(Fosse和Winship,2019^[44];Yang,2008^[45]),由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能够对群体产生相似的影响,从而在不同世代的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命轨迹。APC模型能够有效把某个社会现象分解成“年龄”“时期”和“世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净效应,从而从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时间角度找出影响该社会现象变迁的不同原因(Yang和Land,2008)^[46]。基于上述优点,APC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吴晓刚和李晓光,2021)^[47]、人口学(吕利丹和赵翔宇,2022)^[48]和流行病学(姜雯等,2021)^[49]等学科的社会变迁相关研究中。据此,本文采用APC模型能够有效分析不同时期、世代和年龄对工作-家庭平衡观带来的影响,刻画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并找出其变化原因。

本文借鉴Inglehart(1997)^[50]的现代化演进理论对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做进一步的阐述。Inglehart(1997)^[50]用两个假设来解释个人价值观的变迁:一是匮乏假设,即成长时期社会经济环境所缺乏的因素对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个体成长于经济和社会等不安全的环境中,人们就会更为重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而如果成长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人们会更重视社会参与和自我超越等非物质目标。二是社会化假设,强调个人价值观是其成长关键期(即青少年及成年初期)社会化的结果,而成年后个人价值观会保持相对稳定。因此,随着时期和世代更替会产生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现象。

(1)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个人价值观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社会变迁(高海燕等,2022^[3];Yuan等,2022^[51])。由于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例如,社会发展)是塑造个人价值观的重要动力(Bianchi,2016^[52],2020^[24];Ciecuch等,2016^[53];Varnum和Grossmann,2017^[54]),因此,受

到同样的宏观社会环境影响的群体会呈现出特定、相似的个人价值观取向(Sagiv等,2017^[18];Ralston等,2018^[55])。进一步地,由于在不同时期成长的人群具有不同的个人价值观,导致某个时期点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个人价值观变迁现象(Sagiv和Schwartz,2022^[30];Yuan等,2022^[51])。例如,中国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在不同年代具有显著变迁(刘琳琳等,2020)^[5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为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Bianchi,2020^[24];Bigley和Weniger,2019^[25];Sirola和Pitesa,2018^[28];DiPietro,2009^[57])。具体来说,近30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人的收入增长率提高,实现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导致人们逐渐降低了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社会安全稳定的提高使人们更加重视社会参与和自我超越等非物质目标,从而降低了对工作的关注(Cao,2020)^[14],表现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下降。然而,从201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变缓,2012年GDP增速(7.86%)相较于上一年度增速(9.55%)下滑较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58],这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重要性(Kafka和Kostis,2021)^[59],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使得生存价值观再度成为人们的优先选项(Norris和Inglehart,2019)^[60],导致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高海燕等,2022)^[3],表现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时期效应):近30年以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在2012年前后达到最低。

(2)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不同代际群体具有不同的个人价值观。“代”被定义为一个拥有相同出生年代并经历相同重大历史事件的群体(Kupperschmidt,2000)^[61]。由于重大历史事件对出生在不同年代、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导致不同代际群体的价值观和行动模式产生差异(Mannheim,2013)^[62],并出现明显的代际价值观差异现象(唐宁玉等,2023^[10];Strauss等,1992^[63];Thau和Heflin,1997^[64]),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规律(Egri和Ralston,2004)^[65]。例如,中国的不同出生世代群体在变革开放性、保守性、自我增强和自我超越等个人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Tang等,2017)^[66]。类似地,本文认为,中国人的工作-家庭平衡观也存在世代效应。

参考现有研究(陈玉明和崔勋,2014^[67];赵宜萱等,2019^[68]),本文采用10年作为固定时间间隔,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的人划分为50后(1950—1959年)、60后(1960—1969年)、70后(1970—1979年)、80后(1980—1989年)和90后(1990—1999年)共五个世代,并据此分析不同代际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具体地,50后和60后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年),当时国家将提供就业的责任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Tang和Parish,2000)^[69],人们不需要为工作奔波,加上当时人们仍崇尚精神生活、贬损物质利益(陈坚和连榕,2011)^[70],这导致50后和60后并没有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放在首位,表现为工作-家庭平衡观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文革期间(1966—1976年),工作逐渐成为维持个人身份和经济收入的唯一方式(Walder,1986^[71];Westwood和Lok,2003^[72]),把工作放在首位能够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同时,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则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Lu,1999)^[73],促使70后群体逐渐转向关注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表现为工作-家庭平衡观开始上升。改革开放后,在“先富带动后富”和“致富光荣”等观念指引下(Naughton,1993)^[74],企业开始用物质来激励员工,导致80后群体的工作-家庭平衡观急剧上升。1992年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的快速繁荣为90后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生活,其对工作之外的生活(例如,家庭)重视程度增加,导致工作-家庭平衡观逐渐降低(Inglehart,2016)^[7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世代效应):50后和6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较低,70后和8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

(3)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个人价值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Baltes和Silverberg,2019)^[76],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即儿童、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和老年)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Erikson,1993)^[77]。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需求会发生变化(O'Rand和Krecker,1990)^[78],人们需要权衡不同的得失,并形成不同年龄段的独特体验(Egri等,2012^[79];Robinson,2013^[80]),从而导致不同年龄阶段的价值观差异(Erikson和Erikson,1997^[81];Kagitçibasi等,1997^[82];Nemiroff和Colarusso,1990^[83];Schwartz,2011^[84])。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人生阶段(例如,进入职场和组建家庭等)(Levinson等,1978)^[85]会导致人们看待工作和家庭的重要性程度发生变化(Ellingson等,2016^[86];Zacher和Froidevaux,2021^[87])。具体来说,在刚进入职场到组建家庭前(一般为35岁前),由于年轻人更加看重自由和自主性(Jin和Rounds,2012)^[17],工作没有那么重要,人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组建家庭后,由于家庭经济(例如,养育小孩)和个人成就(例如,“三十而立”)的双重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关注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Kooij等,2011)^[88],人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开始上升。当人们实现一定的经济水平和职业成就之后(45岁左右),人们不再需要过多地依赖于物质,与工作相关的外在动机(例如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Kooij等,2011)^[88],人们将重心转向家庭,表现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下降,并且在退休后(55岁左右)下降速度变得更快(Zacher和Froidevaux,2021)^[8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45岁左右达到最高。

3. 影响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因素

根据Inglehart(1997)^[50]的现代化演进理论,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导致人们对于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追求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从而形成个人价值观变迁现象。也就是说,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具有显著影响。参考现有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施国春等,2021^[89];辛素飞等,2021^[90],2022^[91];Xin等,2020^[92]),本文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变迁的社会因素。

第一,社会经济条件能够对人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产生直接的影响。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毛中根和叶胥,2016)^[93],能够把收入用于非食物消费上(任杲和宋迎昌,2021)^[94]。这意味着,人们通过工作获取经济收入的压力降低,经济充裕使人们将重心逐渐从工作转向家庭(Cao,2020)^[14]。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水平越高、富裕程度越高(即恩格尔系数越低),工作-家庭平衡观越低(Inglehart,1997)^[50]。此外,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走低(翟振武等,2022)^[95],总抚养比也在不断下降(晏月平等,2021)^[96],由于少儿人口的消费能力最强,老年人口最弱(姚青松和赵国庆,2016)^[97],这一环境变化让人们养老和育儿的压力有所下降,对人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产生影响,即抚养压力与工作-家庭平衡观呈正相关关系(Inglehart,1997)^[50]。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等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会影响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迁。

第二,社会联结强度的改变影响工作-家庭平衡观。一方面,中国的家庭结构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演变,家庭规模变小(王跃生,2020)^[98],人们难以从原有的“大家庭”中获得足够的家庭支持和陪伴。此外,家庭环境由于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增加了不稳定性(杨菊华和孙超,2021)^[99],导致人们的安全环境得不到足够满足,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家庭以获得足够的家庭联结强度。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快了人口迁移速度,居住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人际交往频率下降,从人际交往获得的社会联结降低(谢桂华和王小榕,2021)^[100],进而促使人们将重心转向家庭。由于社会联结强度与安全环境需求紧密相连,社会联结强度越大意味着安全需求越得到满足

(Inglehart, 1997)^[50],人们能将重心从家庭转向工作,根据现代化演进理论的匮乏假设观点,社会联结强度越大(即家庭规模越大、离婚率越低、城镇化水平越低),工作-家庭平衡观越高。换言之,社会联结的强度与工作-家庭平衡观呈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家庭规模、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联结因素会改变工作-家庭平衡观。

第三,社会威胁也能对工作-家庭平衡观产生影响。近30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而上升,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陈刚等,2009^[101];章友德等,2019^[102]),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王敏和黄滢,2015)^[103],导致人们缺乏足够的身体和心理安全环境。此外,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交通事故死亡或伤残的家庭成员不仅导致生产力损失,也促使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重心转向家庭而非工作(王璐,2019)^[104]。进一步地,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交网络进步使人们能够更快速、敏感地感受到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社会威胁(例如,暴力事件和交通事故得以更快传播开来),导致人们从亲密关系中获得心理安全感的需求就越大。由于家庭是人们心理安全的重要来源,这就迫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家庭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威胁的增加,工作-家庭平衡观将会下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社会威胁也能够带来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化,本文选用每万人逮捕比(犯罪率)、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和交通事故死亡伤率作为社会威胁的反映指标。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将采用WVS的数据来开展研究。WVS是一项旨在跟踪全球价值观变化趋势的大规模调查项目,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于1981年发起,在12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调查,是迄今为止有关人类信仰和价值观的规模最大的时间序列调查。该调查平均每隔四年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一次,采用多层阶段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方法,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严洁,2018)^[105]。自1989年第二轮调查起,WVS已在我国收集了六轮数据,横跨近30年的时间(1990—2018年),系统收集了我国社会、省市、家庭和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经济、人口、价值观等相关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高海燕等,2022^[3];石超和乔晓春,2017^[106])。除采用WVS调查数据外,本文所采用的部分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

2. 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测量

根据对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本研究从WVS中选取了工作重要性(题项为“工作在您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家庭重要性(题项为“家庭在您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两个题目(均采用Likert 4点量表计分,1 = “很重要”,4 = “很不重要”)。计算步骤为:首先,对上述两题项进行反向处理,使其分数越高,代表越重要。其次,将工作重要性分数减去家庭重要性的分数再加4,最终得到每一个样本的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分值,分数越高代表工作相较于家庭对个体更重要。在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共10496个有效样本数据,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工作-家庭平衡观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年份/年	样本数/个	平均年龄/年	女性比例(%)	工作-家庭平衡观
1990	995	39.31(13.97)	39.90	3.97(0.89)
1995	1464	38.58(13.74)	46.86	3.83(0.72)

续表 1

年份/年	样本数/个	平均年龄/年	女性比例(%)	工作-家庭平衡观
2001	981	40.09(11.44)	50.05	3.84(0.76)
2007	1854	44.28(13.21)	53.24	3.55(0.79)
2012	2190	43.64(14.82)	50.73	3.34(0.81)
2018	3012	44.58(14.50)	54.95	3.42(0.80)
合计	10496	42.58(14.13)	50.75	3.57(0.82)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3. 控制变量和社会指标数据测量

控制变量。在分析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时,首先,本文控制了年龄(单位:岁)和性别(1=女,0=男)这两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其次,由于工作-家庭平衡观直接与工作和家庭直接相关,本文控制了就业(2=全职,1=兼职,0=其他[含退休、家庭主妇、学生、失业和其他五类])和婚姻状况(1=已婚;0=其他[含同居、离异、分居、丧偶和单身五类])。上述数据整理自WVS。

社会指标变量。在分析影响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因素时,本文从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三方面筛选出共计9个社会指标来衡量宏观社会因素对工作-家庭平衡观变迁的影响。上述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

变量的具体测量方式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观测变量	测量方法
控制变量	年龄	您今年多少岁?
	性别	受访人性别?
	就业状况	您现在是否有工作(包括务农)?
	婚姻状况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社会指标变量	居民消费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与同期内总人口之比(元/人)
	居民恩格尔系数	居民食品支出总额与个人消费支出总额之比(%)
	总抚养比	全国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家庭规模	全国家庭户总人口与家庭总户数之比(人/户)
	粗离婚率	全国年度离婚数与同期内总人口数之比(‰)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总数之比(%)
	每万人逮捕比	全国每万人刑事犯罪逮捕的人数(人/万人)
	每万人废水排放量	全国每万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万人)
交通事故死伤率	全国交通事故死亡和受伤人数除以交通事故发生总数(人/次)	

4. 分析方法与策略

本研究采用 Stata 16.0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基本分析,了解数据的基本情况。其次,采用 APC 模型来检验假设 H1 - 假设 H3。本文使用的 WVS 数据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即在不同时期或时间点按照 PPS 抽样法抽取不同的样本进行调查,最后根据样本情况来推断总体情况。因此,WVS 数据能够适用于 APC 模型。具体地,Yang 及其合作者分别开发了两种处理 APC 模型的方法,即分类交叉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HAPC)(Yang 和 Land,2006)^[107]和内生因子模型(Intrinsic Estimator,IE)(Yang 等,2008)^[108]。由于 IE 估计方法具有较多的优点(Yang 和 Land,2013)^[109],例如,估计值具有最小样本方差且是无偏的,因此,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采用 IE 估计法进行 APC 模型分析(高海燕等,2022)^[3]。最后,对社会指标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社会指标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预测效果。

四、研究结果

1.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 APC 模型结果

本文采用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分离出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分别做不添加控制变量(模型一)和添加控制变量(模型二,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和就业状况)的模型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由于控制变量前后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的 APC 模型结果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后续将采用不添加控制变量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变迁规律。

表 3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年龄			0.001	0.003
	性别			-0.021*	0.009
	婚姻			-0.008	0.015
	就业状况			0.019***	0.005
年龄	24 岁及以下	0.016	0.017	0.028	0.056
	25 ~ 29 岁	0.010	0.015	0.014	0.042
	30 ~ 34 岁	0.010	0.014	0.013	0.032
	35 ~ 39 岁	0.009	0.014	0.010	0.022
	40 ~ 44 岁	0.029*	0.014	0.026	0.015
	45 ~ 49 岁	0.035*	0.014	0.028*	0.015
	50 ~ 54 岁	0.021	0.015	0.016	0.022
	55 ~ 59 岁	0.004	0.017	0.000	0.033
	60 ~ 64 岁	-0.058***	0.017	-0.058	0.043
	65 岁及以上	-0.076***	0.018	-0.078	0.057

续表 3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时期	1990 年	0.065 ***	0.013	0.063 ***	0.015
	1995 年	0.036 **	0.011	0.037 **	0.012
	2001 年	0.033 *	0.013	0.032 *	0.013
	2007 年	-0.022 *	0.010	-0.022 *	0.010
	2012 年	-0.067 ***	0.010	-0.068 ***	0.011
	2018 年	-0.046 ***	0.010	-0.043 ***	0.012
世代	1929 年及以前	0.027	0.064	0.029	0.069
	1930—1934 年	0.004	0.037	0.003	0.042
	1935—1939 年	0.017	0.039	0.009	0.041
	1940—1944 年	0.006	0.027	0.001	0.028
	1945—1949 年	-0.019	0.022	-0.018	0.023
	1950—1954 年	-0.012	0.018	-0.014	0.019
	1955—1959 年	-0.018	0.017	-0.018	0.017
	1960—1964 年	-0.014	0.017	-0.014	0.017
	1965—1969 年	-0.003	0.015	-0.001	0.015
	1970—1974 年	-0.004	0.013	-0.001	0.015
	1975—1979 年	0.006	0.015	0.006	0.017
	1980—1984 年	0.021	0.017	0.022	0.020
	1985—1989 年	0.015	0.018	0.019	0.023
	1990—1994 年	0.003	0.020	0.005	0.026
1995 年及以后	-0.031	0.030	-0.028	0.037	
截距项		1.534 ***	0.008	1.503 ***	0.125
AIC		3.523		3.51	
BIC		-95448		-85148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1)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假设 H_1 (时期效应) 提出, 近 30 年以来,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 在 2012 年前后达到最低。图 1 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前后的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图。可以看出,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在 1990 年 ($r_{1990} = 0.065, p < 0.001$) 处于最高点, 随后 20 多年一直下降 ($r_{1995} = 0.036, p = 0.002$; $r_{2001} = 0.033, p = 0.011$; $r_{2007} = -0.022, p = 0.033$), 至 2012 年 ($r_{2012} = -0.067, p < 0.001$) 到达最低点后开始上升 ($r_{2018} = -0.046, p < 0.001$)。因此, 假设 H_1 得到支持。

这样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变化有着密切关系。1988 年 9 月,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市场秩序、遏制经济过热等问题, 导致中国经济下行, 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 因此人们需要更加重视工作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随后, 中国经济又开始高速发展, 2001 年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国外的商品和服务等涌入中国,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同时,由于我国收入水平提升等原因,财富的快速增加使人们逐渐降低了对物质的追求,促使工作-家庭平衡观快速下降。然而,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并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导致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又转为上升趋势。

(2)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假设 H_2 (世代效应) 提出,50后和60后的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较低,70后和8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图2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前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图,可以看出,50后($r_{1950} = -0.012, p = 0.532$)和60后($r_{1960} = -0.014, p = 0.401$)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处于较低水平。从65后($r_{1965} = -0.003, p = 0.850$)开始,工作-家庭平衡观迅速上升,并在80后($r_{1980} = 0.021, p = 0.213$)身上达到最大值。接着,工作-家庭平衡观从85后($r_{1985} = 0.015, p = 0.390$)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到95后($r_{1995} = -0.031, p = 0.309$)已经变为负值。因此,假设 H_2 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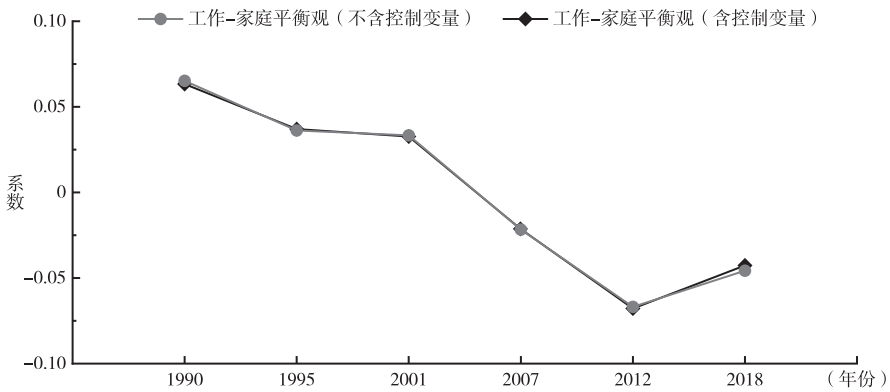


图1 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世代效应差异也能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解释。虽然50后和60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贫穷时期,但其工作-家庭平衡观并没有位于很高水平,反而是80后有较高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这可能是因为,虽然50后和60后所处的年代物质相对匮乏,但是他们经历了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减弱了工作的工具性价值,更加重视家庭等非物质目标(陈坚和连榕,2011)^[70],从而导致工作-家庭平衡观处于较低水平。1978年改革开放后,80后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不安全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于工作和家庭重要性的权衡(高海燕等,2022)^[3],因此,7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开始上升,并在80后身上看到更高的工作-家庭平衡观。1990年深化改革后,随着物质生活、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济和安全需要的满足让90后从小塑造了更不看重工作工具性价值的价值观,更多地转向了非工作目标(唐宁玉等,2023)^[10],从而导致工作-家庭平衡观进一步下降。

(3)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假设 H_3 (年龄效应) 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45岁左右达到最高。图3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前后的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图,可以看出,35岁以下($r_{35} = 0.009, p = 0.515$)人群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到45岁($r_{45} = 0.035, p = 0.011$)人群身上达到最大值。随后,工作-家庭平衡观开始下降,在55岁($r_{55} = 0.004, p = 0.809$)之后急剧下降,并在60岁($r_{60} = -0.058, p = 0.001$)开始转向负值。因此,假设 H_3 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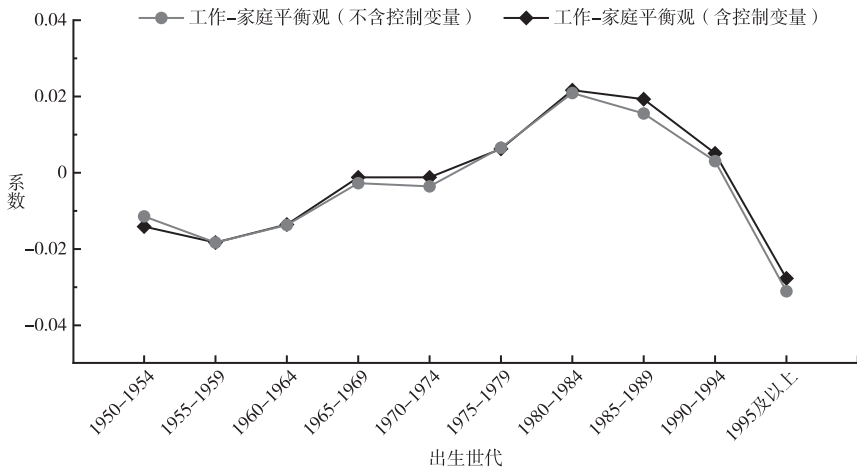


图 2 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的人口发展规律能够对年龄效应做出解释。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持续攀升,2010年城市地区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接近 26 岁(和红和谈甜,2021)^[110],到 2020 年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已接近 29 岁(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111]。人们一般婚后 2—5 年生育小孩,这就导致人们在 35 岁前后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导致人们不得不将重心放到工作上,从而导致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上升。之后,随着个人事业取得了更好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得到提高,家庭经济压力得以缓解,工作-家庭平衡观转为下降,在退休后下降速度则更快了,基本符合中国人的生命轨迹发展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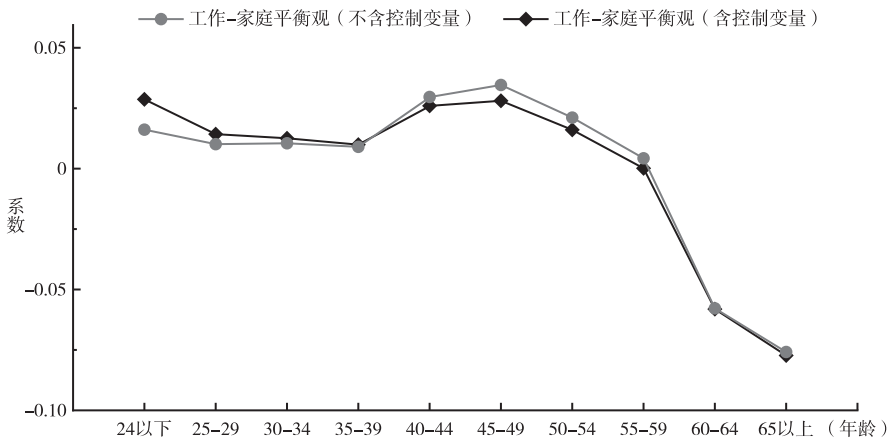


图 3 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社会变迁研究中假定社会统计指标可以作为社会大环境的量化表现且可以部分地解释个人心理量的变化,对社会指标和心理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可以探究和证明社会变迁对心理特征的影响(施国春等,2021^[89];辛素飞等,2021^[90],2022^[91];Twenge,2000^[112])。也就是说,通过分析社会指标和心理指标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社会变迁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即选择与某一群体的心理指标关系密切的社会指标和心理指标的均值进行直接相关或滞后相关分析。例如,如果当年、5年前、3年前和 1 年前的社会指标(例如,离婚率等)和心理指标(例如,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相关显著,那么可以说明社会变迁对心理变迁具有一定的“影响”(辛素飞等,2021^[90],2022^[91];Twenge,

2000^[112])。因此,为了更好地刻画社会变迁对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可能影响,本文将当年、5年前、3年前和1年前的社会指标(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三个维度共9个指标)与工作-家庭平衡观做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除了个别结果外,当年、5年前、3年前和1年前的大部分社会指标都对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可能是影响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主要社会因素。

表4 当年、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相关系数表

社会指标类型	观测变量	当年	1年前	3年前	5年前
社会经济条件	居民消费水平	0.832 **	-0.823 **	-0.794 *	-0.788 *
	居民恩格尔系数	0.889 **	0.903 **	0.947 ***	0.953 ***
	总抚养比	0.880 **	0.854 *	0.981 ***	0.959 ***
社会联结	家庭规模	0.984 **	0.992 ***	0.850	0.942 *
	粗离婚率	-0.891 **	-0.864 **	-0.809 *	-0.790 *
	城镇化水平	-0.931 ***	-0.931 ***	-0.927 ***	-0.932 ***
社会威胁	每万人逮捕比	-0.907 *	-0.825	-0.979 **	-0.987
	每万人废水排放量	-0.867	-0.908 *	-0.929 **	-0.992 ***
	交通事故死伤率	-0.940 ***	-0.960 ***	-0.991 ***	-0.874 *

五、讨论与结论

1. 研究发现

基于现代演化理论,本文利用WVS数据,通过构建APC模型来解析刻画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并分析其社会影响因素,拓展了工作和家庭界面价值观文献,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洞见。本研究发现,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呈现出明显的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这种变化和趋势与宏观社会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具体地,第一,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在2012年前后达到最低点(时期效应);第二,50后和6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较低,70后和8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世代效应);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45岁左右达到最高(年龄效应);最后,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趋势主要被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三方面共9项社会指标所解释。具体地,居民恩格尔系数、总抚养比和家庭规模与工作-家庭平衡观显著正相关,居民消费水平、粗离婚率、城镇化水平、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和交通事故死伤率与工作-家庭平衡观显著负相关。

2. 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本文构建了工作-家庭平衡观构念,拓展了工作和家庭领域界面的个人价值观文献。现有价值观文献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个人价值观在工作中对人们工作态度、行为和选择的影响(Parry和Urwin,2011^[12];Arieli等,2020^[16]),然而,却忽略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态度和取向问题(Shockley等,

2018)^[113]。个人价值观不仅仅是在某一个领域内的价值取向(Sagiv 等,2017)^[18],人们在跨领域同样面临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排序问题,即跨领域的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家庭平衡观)同样能对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人们对待工作和家庭目标的优先级能够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Masuda 和 Sortheix,2012)^[114]。本研究对工作-家庭平衡观做了清晰的概念性定义,明确其本质内涵为一种个人价值观,并提供了操作性定义,使其能够量化测量,为工作和家庭界面跨领域的个人价值观提供了新视角。更重要的是,工作-家庭平衡观突破了单一领域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价值观)(Arieli 等,2020)^[16]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能够为指引人们在工作和家庭跨领域追求自我目标,并做出合适的选择(例如,职业选择)(Bardi 等,2014)^[39]和行为表现(例如,工作狂)(Schaufeli 等,2009)^[36]提供新的理论见解。总之,工作-家庭平衡观概念弥补了现有工作和家庭界面个人价值观研究的缺失,拓展了工作和家庭领域界面价值观文献,为个人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本文通过构建 APC 模型揭示了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在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上的变迁规律。虽然个人价值观在个体身上具有相对稳定性(Sagiv 等,2017^[18];Sagiv 和 Schwartz,2022^[30]),但是,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例如,重大历史事件)是塑造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家庭平衡观)的重要动力(Sagiv 等,2017^[18];Sagiv 和 Schwartz,2022^[30];Cieciuch 等,2016^[53];Varnum 和 Grossmann,2017^[54]),这导致个人价值观在不同群体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Tang 等,2017)^[66]。然而,Rhodes(1983)^[115]指出,横断面研究不足以检验代际差异,因为难以将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分开。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例如,工作-家庭平衡观)会同时受到时期、世代和年龄因素的影响,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同时存在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Parry 和 Urwin,2011)^[12]。本文采用的 APC 模型能够有效地将上述三种效应分解(Yang 和 Land,2008)^[46],从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维度揭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超越了以往仅从单个方面(例如,世代效应)(Yang 等,2018)^[13]探讨个人价值观社会变迁的局限性(Parry 和 Urwin,2011)^[12]。此外,本研究也揭示了价值观的变迁动态性,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方向。因此,基于对工作-家庭平衡观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的探索和分析,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个体工作和家庭领域的价值观变化规律,更为近 30 年来中国人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提供重要的理论启发(蔡华俭等,2020^[1];傅小兰和蔡华俭,2016^[2])。

第三,本文探讨了宏观社会指标(即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对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影响,为探索宏观社会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价值观的前因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社会变迁研究不仅仅需要探究其变迁规律,更需要探究影响变迁规律的宏观社会因素,以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变迁规律。本文借鉴横断历史研究(Twenge,2000^[112];辛自强和池丽萍,2008^[116]),将宏观社会因素与工作-家庭平衡观匹配后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等宏观社会指标对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发现拓展了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人价值观影响的认识,为探索宏观社会指标与个人价值观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变迁的原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地,由于在工作场所外的组织外部条件对工作场所中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Bianchi,2020)^[24],例如,经济衰退对工作满意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Bianchi 等,2023)^[117],本文的发现也能够为后续探讨工作和家庭领域个人价值观的前因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政策制定者、组织和个体都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第一,从政策制定的层面来看,政府需要关注中国人的工作-家庭平衡观社会变迁规律,以及宏观社会政策对工作-家庭平衡观社会变迁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例如,本研究发现社会联结的降低可能导致工

作-家庭平衡观的下降,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采取一些促进社会联结的政策以鼓励人们将重心放到工作上,例如,在社区中建立更多的社会支持网络(例如,社区活动中心)或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家庭陪伴(例如,举办亲子活动)。第二,对于组织而言,组织需要关注工作-家庭平衡观对不同组织成员的影响。组织应该意识到不同世代的组织成员具有不同的工作-家庭平衡观,这导致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时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本研究发现90后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处于下降趋势,组织可以适当地在90后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他们对工作的重要性评估。第三,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需要认识到自身在不同阶段、环境下工作-家庭平衡观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个人的职业规划,从而更好地应对和调整工作态度和行为。例如,本研究发现人们在35岁及以下工作-家庭平衡观较低,而这个阶段又是进入职场最宝贵的时期,因此,个体可在35岁前制定好职业发展目标和规划,明确的目标有助于降低人们因环境或年龄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工作懈怠等问题,避免工作重要性降低的负面影响。

4. 研究优势、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较多的优势,例如,构建了工作-家庭平衡观概念,并借鉴APC模型,通过采用WVS数据探讨了近30多年来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规律,这些都反映了本文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第一,本研究借鉴APC模型探讨了工作-家庭平衡观的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但未讨论个体其他特征差异。例如,男女性在成为父母后价值观的变化出现差异(Lönnqvist等,2018)^[118],未来可以探讨不同性别群体的工作-家庭平衡观社会变迁规律。第二,本文重点关注了宏观社会指标(即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对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影响。然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Sagiv等,2017^[18];Sagiv和Schwartz,2022^[30]),例如,父母的价值观可能在子女间形成代际传递(齐亚强和牛建林,2021)^[119],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因素(例如,父母的价值观)对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影响。第三,本文仅关注了国家层面工作-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然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居民的个人价值观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Chua等,2019)^[120]。例如,相比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工人更重视工作如何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Cao,2020)^[14]。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作-家庭平衡观变迁规律,并找出影响工作-家庭平衡观变迁的社会因素。

参考文献

- [1]蔡华俭,黄梓航,林莉.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J].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20,(10):1599-1618.
- [2]傅小兰,蔡华俭.心安国安 心治国治——把握时代心理脉搏 提升国家凝聚力[J].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11):1224-1236.
- [3]高海燕,王鹏,谭康荣.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J].北京:社会学研究,2022,(1):156-178,229.
- [4]黄梓航,王俊秀,苏展.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J].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21,(12):2246-2259.
- [5]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8,(3):83-101,207.
- [6]郭云蔚.受教育水平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及其时代变化[J].北京:人口研究,2021,(6):96-109.
-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J].北京:管理世界,2022,(1):1-19,34,20.
- [8]李月,张许颖.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J].北京:人口学刊,2021,(4):1-11.
- [9]郑真真.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21,(3):65-85,205.

- [10]唐宁玉,甄丹蕾,关键.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J/OL].北京:心理学报,2023,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abstract/abstract15534.shtml.
- [11]Chen,J.,and R.Lia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in China[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5,43,(4):567-578.
- [12]Parry,E.,and P.Urwi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1,13,(1):79-96.
- [13]Yang,J.,C.S.Yu.,and J.Wu. Work Values Across Generations in China[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2018,12,(3):486-505.
- [14]Cao,Y. Economic Development,Market Transition,and Work Values in Post-Socialist China[J]. *Social Forces*,2020,99,(2):760-796.
- [15]Aryee,S.,and V.Luk. Balancing Two Major Parts of Adult Life Experience: Work and Family Identity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J]. *Human Relations*,1996,49,(4):465-487.
- [16]Arieli,S.,L.Sagiv,and S.Roccas. Values at Work:The Impact of Personal Values in Organisations[J]. *Applied Psychology*,2020,69,(2):230-275.
- [17]Jin,J.,and J.Round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Work Values: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2,80,(2):326-339.
- [18]Sagiv,L.,S.Roccas,J.Cieciuch,et al. Personal Values in Human Life[J]. *Nature Human Behaviour*,2017,1,(9):630-639.
- [19]Loscocco,K.A. The Instrumentally Oriented Factory Worker: Myth or Reality? [J]. *Work and Occupations*,1989,16,(1):3-25.
- [20]Bardi,A.,and S.H.Schwartz. Values and Behavior: Strength and Structure of Relation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3,29,(10):1207-1220.
- [21]Ros,M.,S.H.Schwartz.,and S.Surkiss. Basic Individual Values, Work Values, and the Meaning of Work [J]. *Applied Psychology*,1999,48,(1):49-71.
- [22]Schwartz,S.H. An Overview of the Schwartz Theory of Basic Values[J].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2012,2,(1):1-20.
- [23]Sortheix,F.M.,A.Chow,and K.Salmela-Aro. Work Valu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Work Life:A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5,89:162-171.
- [24]Bianchi,E.C. How the Economy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selves and Others[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2020,32:120-123.
- [25]Bigley,J.,and M.Wenig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Work Values:A Global Perspective[J].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Journal*,2019,3,(3):926-949.
- [26]Gallie,D. Research on Work Values in a Chang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19,682,(1):26-42.
- [27]Ollier-Malaterre,A.,and A.Foucreault. Cross-National Work-Life Research:Cultural and Structural Impacts for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43,(1):111-136.
- [28]Sirola,N.,and M.Pitesa.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Psychology of Work Evalua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8,144:11-24.
- [29]Williams,R.M. *American Society: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M]. New York:Knopf,1970.
- [30]Sagiv,L.,and S.H.Schwartz. Personal Values Across Culture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22,73:517-546.
- [31]Schwartz,S.H. A Theory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Work[J]. *Applied Psychology*,1999,48,(1):23-47.
- [32]Rokeach,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 New York:Free Press,1973.
- [33]Schwartz,S.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2,25,(1):1-65.
- [34]Boer,D.,and R.Fischer. How and When Do Personal Values Guide Our Attitudes and Sociality? Explaining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Attitude-Value Linkag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3,139,(5):1113-1147.
- [35]Wolf,L.J.,N.Weinstein.,and G.R.Maio. Anti-Immigrant Prejudice: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Perceived) Values and Value Dissimilar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9,117,(5):925-953.
- [36]Schaufeli,W.B.,A.Shimazu,and T.W.Taris. Being Driven to Work Excessively Hard:The Evaluation of a Two-Factor Measure of Workaholism in the Netherlands and Japan[J]. *Cross-Cultural Research*,2009,43,(4):320-348.
- [37]Schwartz,S.H. Value Priorities and Behavior:Applying a Theory of Integrated Value Systems[J]. *The Psychology of Values:The*

Ontario Symposium,1996,8:1-24.

[38] Arieli, S., L. Sagiv, and E. Cohen-Shalem. Values in Business Schools: The Role of Self-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16, 15, (3): 493-507.

[39] Bardi, A., K. E. Buchanan., R. Goodwin, et al. Value Stability and Change during Self-Chosen Life Transitions: Self-Selection vs. Socialization Effec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4, 106, (1): 131-147.

[40] Greenhaus, J. H., K. M. Collins., and J. D. Shaw.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3, 63: 510-531.

[41] Hirschi, A., K. M. Shockley., and H. Zacher. Achieving Work-Family Balance: An Action Regulation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9, 44, (1): 150-171.

[42] Sagiv, L., and S. Roccas. What Personal Values Are and What They Are Not: Taking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 Springer: Cham, 2017.

[43] Sagiv, L., and S. Roccas. How Do Values Affect Behavior? Let Me Count the Way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21, 25, (4): 295-316.

[44] Fosse, E., and C. Winship. Analyzing Age-Period-Cohort Data: A Review and Critiqu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 45, (1): 467-492.

[45] Yang, Y.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 (2): 204-226.

[46] Yang, Y., and K. C. L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08, 36, (3): 297-326.

[47] 吴晓刚, 李晓光.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的变迁趋势——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动态分析[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2): 102-122, 206-207.

[48] 吕利丹, 赵翔宇.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 1930—1969 年出生队列的分析[J]. *北京: 人口研究*, 2022, (1): 54-69.

[49] 姜雯, 张蓝超, 李伟豪. 中国居民 2012—2017 年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年龄-时期-队列分析[J]. *北京: 中国公共卫生*, 2021, (6): 915-920.

[50] 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1] Yuan, M., G. Spadaro., S. Jin., et al. Did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Social Dilemmas(1956-2017)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22, 148, (3-4): 129-157.

[52] Bianchi, E. C. American Individualism Rises and Falls with the Economy: Cross-Temporal Evidence That Individualism Declines When the Economy Fal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6, 111, (4): 567-584.

[53] Cieciuch, J., E. Davidov., and R. Algesheimer.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Value Structure and Priorities in Childhood: A Longitudinal Study[J]. *Social Development*, 2016, 25, (3): 503-527.

[54] Varnum, M. E., and I. Grossmann. Cultural Change: The How and the Why[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12, (6): 956-972.

[55] Ralston, D. A., C. P. Egri., C. M. Karam, et al. Changes in Work Values across the Regions of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35, (1): 145-179.

[56] 刘琳琳, 朱廷劭, 任孝鹏.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代际变迁 1949—2010: 来自《人民日报》的证据[J]. *长沙: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3): 542-549, 555.

[57] DiPietro, W. The Role of Individu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 2009, 8, (1): 40-47.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4* [J].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59] Kafka, K. I., and P. C. Kostis. Post-Materi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Cultural Backlash, 1981-2019[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1, 49, (4): 901-917.

[60] Norris, P., and R. Inglehart.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61] Kupperschmidt, B. R.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J]. *The Health Care Manager*, 2000, 19,

(1):65-76.

[62] Mannheim, K. Structures Of Thinking[M]. London:Routledge,2013.

[63] Strauss, W. , and N. Howe.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 1584 to 2069 [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92.

[64] Thau, R. D. , and S. J. Heflin. Generations Apart: Xers vs. Boomers vs. the Elderly[M].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7.

[65] Egri, C. P. , and D. A. Ralston. Generation Cohor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 (2): 210 - 220.

[66] Tang, N. , Y. Wang. , and K. Zhang. Values of Chinese Generation Cohorts; Do They Matter in the Workplace?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7, 143: 8 - 22.

[67] 陈玉明, 崔勋. 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 [J]. 北京: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 (13): 43 - 48.

[68] 赵宜萱, 赵曙明, 徐云飞. 基于 20 年成就方式数据的中国员工代际差异研究 [J]. 武汉: 管理学报, 2019, (12): 1751 - 1760.

[69] Tang, W. , and W. L.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 (4): 979 - 980.

[70] 陈坚, 连榕. 代际工作价值观发展的研究述评 [J]. 北京: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1): 1692 - 1701.

[71] Walder, A.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72] Westwood, R. , and P. Lok. The Meaning of Work in Chinese Contexts: A Comparativ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03, 3, (2): 139 - 165.

[73] Lu, X. An Ideological/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J]. Discourse & Society, 1999, 10, (4): 487 - 508.

[74] Naughton, B.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3, 135: 491 - 514.

[75] Inglehart, R. After Postmaterialism; An Essay on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ment [J].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41, (2): 213 - 222.

[76] Baltes, M. M. , and S. B. Silverberg. The Dynamics Between Dependency and Autonomy; Illustrations Across the Life Spa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77] Erikson, E.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78] O'Rand, A. M. , and M. L. Krecker. Concepts of the Life Cycle; Their History, Meanings, and Us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6): 241 - 262.

[79] Egri, C. P. , S. E. Khilji. , D. A. Ralston. , et al. Do Anglo Countries Still Form a Values Cluster? Evidence of the Complexity of Value Change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 (2): 267 - 276.

[80] Robinson, O. C. Values, and Adult Age; Findings from Two Cohorts of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J].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2013, 10, (1): 11 - 23.

[81] Erikson, E. , and J. M. Erikson.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82] Kagitçibasi, Ç. , J. W. Berry, and M. H. Segall.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ocial Behavior and Applications [M].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83] Nemiroff, R. A. , and C. A. Colarusso. New Dimensions in Adult Development [M].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1990.

[84] Schwartz, S. H. Studying Values; Personal Adventure, Future Direction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2, (2): 307 - 319.

[85] Levinson, D. , C. Darrow, E. Klein, et al.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M]. New York: Knopf, 1978.

[86] Ellingson, J. E. , M. J. Tews, and A. M. Dachner. Constituent Attachment and Voluntary Turnover in Low-Wage/Low-Skill Service Work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6, 101, (1): 129 - 140.

[87] Zacher, H. , and A. Froidevaux. Life Stage, Lifespan,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s on Vocation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21, 126: 103476.

[88] Kooij, D. T. , A. H. De Lange. , P. G. W. Jansen, et al. Age and Work-Related Motives; Results of a Meta-Analysis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1, 32, (2): 197 - 225.

[89] 施国春, 赵东妍, 范会勇. 2004 至 2016 年中国大学生身体自尊的变迁: 一项横断历史研究 [J]. 北京: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5): 648 - 659.

[90] 辛素飞, 梁鑫, 盛靓, 赵智睿. 我国内地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迁 (2002 ~ 2019): 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 [J]. 北京: 心理学报,

2021,(8):875-889.

- [91]辛素飞,赵智睿,彭海云,盛靓.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变迁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J].北京:教师教育研究,2022,(3):108-114.
- [92]Xin,S.,Y. Wang.,and L. Sheng. Impact of Social Changes and Birth Cohort on Anxiety in Adolescents in Mainland China (1992-2017):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6:105159.
- [93]毛中根,叶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居民消费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3):53-61,158.
- [94]任昫,宋迎昌.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研究——基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J].兰州学刊,2021,(3):33-45.
- [95]翟振武,金光照,张逸杨.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北京:人口研究,2022,(4):3-13.
- [96]晏月平,黄美璇,郑伊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趋势研究[J].济南:东岳论丛,2021,(1):148-163.
- [97]姚青松,赵国庆.抚养比、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1995—2014[J].北京:金融评论,2016,(2):39-48,124-125.
- [98]王跃生.城乡家户、家庭规模及其结构比较分析[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20,(6):11-24,241.
- [99]杨菊华,孙超.我国离婚率变动趋势及离婚态人群特征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2):63-72.
- [100]谢桂华,王小榕.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社会关系转变[J].北京:社会学评论,2021,(3):120-142.
- [101]陈刚,李树,陈屹立.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J].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9,(4):52-61,111-112.
- [102]章友德,杜建军,徐吟川.城市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与犯罪率——基于227个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J].上海:世界经济文汇,2019,(1):84-100.
- [103]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北京:经济学(季刊),2015,(2):557-578.
- [104]王璐.1990—2017年中国道路交通伤害死亡流行特征及其预测研究[D].武汉大学,2019.
- [105]严洁.政治学研究中的抽样调查:难点、问题与方法创新[J].北京:政治学研究,2018,(3):17-28,125.
- [106]石超,乔晓春.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分析[J].北京:人口与发展,2017,(4):41-50.
- [107]Yang,Y.,and K. C. Land.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J].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2006,36,(1):75-97.
- [108]Yang,Y.,S. chulhofer-Wohl.,W. J. Fu, et al. The Intrinsic Estimator for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Use I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8,113,(6):1697-1736.
- [109]Yang,Y.,and K. C. L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M]. Boca Raton: Taylor & Francis,2013.
- [110]和红,谈甜.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特点及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J].北京:人口学刊,2021,(5):16-28.
- [111]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112]Twenge,J. M. The Age of Anxiety? The Birth Cohort Change in Anxiety and Neuroticism,1952-1993[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79,(6):1007-1021.
- [113]Shockley,K. M.,W. Shen, and R. C. Johnso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Global Work-Family Interface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 [114]Masuda,A. D.,and F. M. Sorthaix. Work-Family Values, Priority Goal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Seven Year Follow-Up of MBA Student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2,13,(6):1131-1144.
- [115]Rhodes,S. R.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 Review and Conceptual Analy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3,93,(2):328-367.
- [116]辛自强,池丽萍.横断历史研究:以元分析考察社会变迁中的心理发展[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44-51.
- [117]Bianchi,E. C.,C. C. Martin.,and R. Li. Does Job Satisfaction Rise and Fall with the Economy? Cross-Sectional, Longitudi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Job Satisfaction Increases during Recess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23,66,(2):688-709.
- [118]Lönngqvist,J. E.,S. Leikas.,and M. Verkasalo. Value Change in Men and Women Entering Parenthood: New Mothers' Value Priorities Shift Towards Conservation Value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8,120:47-51.
- [119]齐亚强,牛建林.家庭成就观的代际传承及其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影响[J].北京:青年研究,2021,(6):13-26,91.
- [120]Chua,R. Y.,K. G. Huang.,and M. Jin. Mapping Cultural Tightness and Its Links to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and Happiness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9,116,(14):6720-6725.

Changes in Chinese Personal Values of Work-Family Balance

GUAN Jian, SUN Yu-qing, CHEN Qian, ZHANG Xin-an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Work and family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adult lif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work over family reflects a person's value orientation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hich we refer to here as work-family balance values (WFBVs). As one of the personal values, WFBVs determine peopl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the field of work and family,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Given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fter 1978), we believe that Chinese WFBVs may have chang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have Chinese WFBVs changed in the past 30 years? Second, what are the main social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se changes in Chinese WFBVs?

Using data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changes in WFBVs among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discussed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changes by combin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To be specific, we measured WFBVs by using two items rela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work 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 the WVS database. Then, we draw on the Age-Period-Cohort model (i. e., APC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 across age, period, and cohort. On this basis, we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dicators, including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residents' Engel coefficient and total dependency ratio), social connectedness (family size, divorce rat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ocial threat (crime rate, sewage pollution and traffic accident rate), and WFBVs change, and constructed a social antecedent model of WFBVs change.

This paper reports four main findings: (1) Regarding the age effect, 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peaked in 1990 ($r_{1990} = 0.065, p < 0.001$), and then declined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r_{1995} = 0.036, p = 0.002$; $r_{2001} = 0.033, p = 0.011$; $r_{2007} = -0.022, p = 0.033$), after reaching the lowest point in 2012, they bounced back slightly and turned into an upward trend ($r_{2012} = -0.067, p < 0.001$) ($r_{2018} = -0.046, p < 0.001$). (2) Regarding the period effect, 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were low for the post-50s ($r_{1950} = -0.012, p = 0.532$) and post-60s ($r_{1960} = -0.014, p = 0.401$) generations, and then increased rapidly for the post-65s ($r_{1965} = -0.003, p = 0.850$). It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post-80s ($r_{1980} = 0.021, p = 0.213$). From the post-85s generation onwards, WFBVs declined again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r_{1985} = 0.015, p = 0.390$), and the decline became faster and faster, reaching a negative value for the post-95s generation ($r_{1995} = -0.031, p = 0.309$). (3) Regarding the cohort effect, 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were lower for people under 35 ($r_{35} = 0.009, p = 0.515$),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age, reaching the peak at 45 ($r_{45} = 0.035, p = 0.011$). It then began to decline, falling sharply after 55 ($r_{55} = 0.004, p = 0.809$) and turning negative at 60 ($r_{60} = -0.058, p = 0.001$). (4) Regarding the social influencers of WFBV changes,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social indicators we examined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WFBVs. Specifically, WFBV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Engel coefficient, total dependency ratio and family size,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divorce rate, urbanization level, crime rate, sewage pollution and traffic accident rate.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WFBVs, thereby offering a more refined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values in the work context. Second, it applies the APC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 more thoroughly from three aspects: age, period, and cohort, which reveal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variations in personal value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periods, and generations in China. Third, it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social indicators (i. 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ties, and social threats) and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 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work and family related values from the social factor level.

Key Words: work-family balance values (WFBVs); social changes; age-period-cohort model; Chinese

JEL Classification: H83, J81, M12

DOI: 10.19616/j.cnki.bmj.2023.11.007

(责任编辑:舟山)